

出版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曾永義
主編

輯刊 文學研究 古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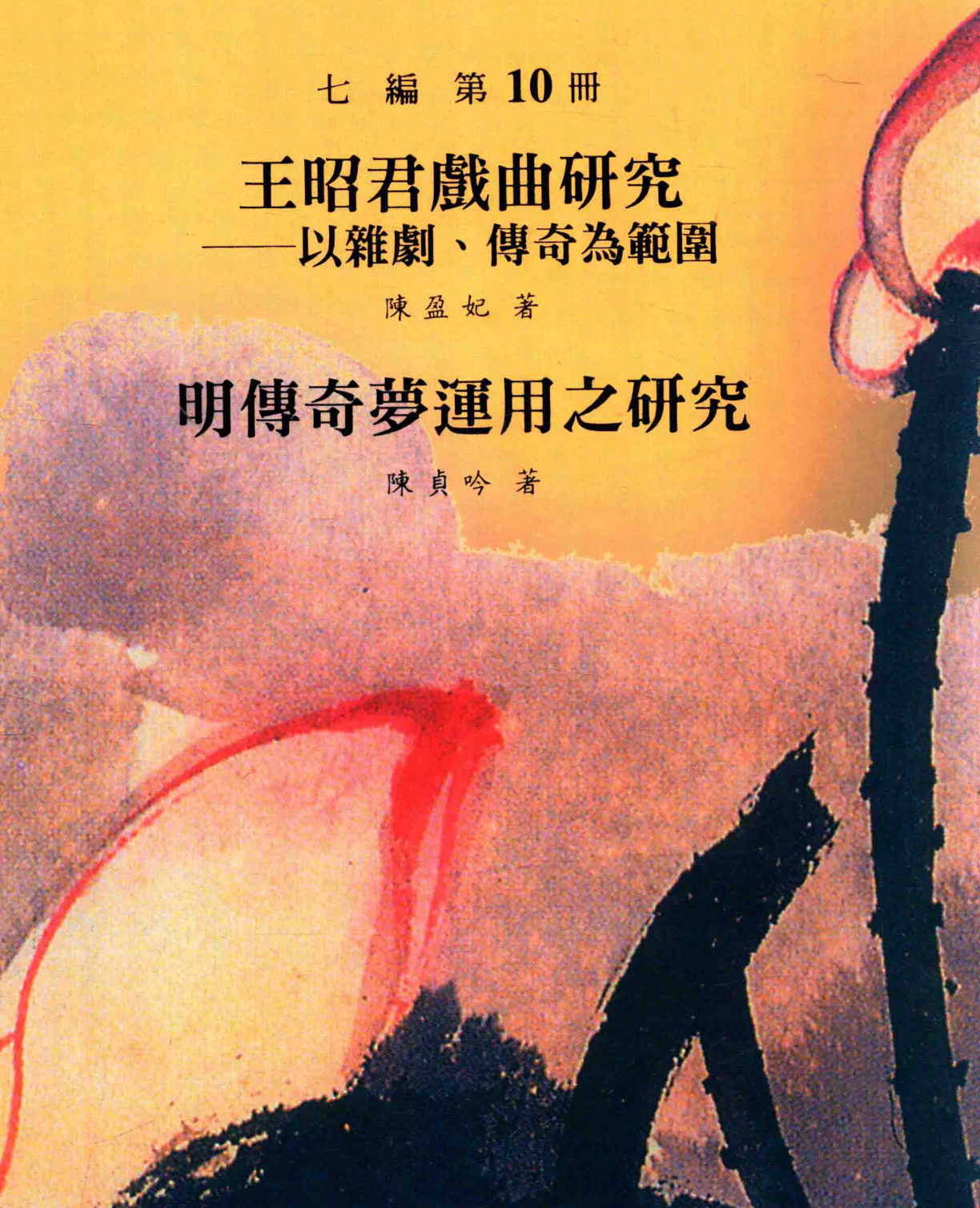
七 編 第 10 冊

王昭君戲曲研究 ——以雜劇、傳奇為範圍

陳盈妃 著

明傳奇夢運用之研究

陳貞吟 著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七 編

曾 永 義 主編

第 10 冊

王昭君戲曲研究
——以雜劇、傳奇爲範圍

明傳奇夢運用之研究

陳 貞 吟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王昭君戲曲研究——以雜劇、傳奇為範圍 陳盈妃 著／明傳奇夢運用之研究 陳貞吟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民102〕

目 2+94 面／目 2+94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七編；第 10 冊）

ISBN：978-986-322-099-2（精裝）

1. 明代傳奇 2. 雜劇 3. 戲曲評論

820.8

102001631

ISBN-978-986-322-099-2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七 編 第 十 冊

ISBN：978-986-322-099-2

王昭君戲曲研究——以雜劇、傳奇為範圍
明傳奇夢運用之研究

作 者 陳盈妃／陳貞吟

主 編 曾永義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3 年 3 月

定 價 七編 16 冊（精裝）新台幣 2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王昭君戲曲研究
——以雜劇、傳奇爲範圍

陳盈妃 著

作者簡介

陳盈妃，台灣省高雄市人，1969年生，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現任中州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專長為古典戲曲、歷代詩話。著作有《中國文學析賞》，發表的期刊論文有〈唐人虎類小說研究〉、〈明初詞壇所反映之社會現象探究〉、〈真誠的愛與創造——江自得其詩作內容析探〉、〈袁枚在女性墓誌銘中所反映的思想〉、〈二拍中僧道人物的負面形象及其成因析探〉。

提 要

王昭君出塞和番的故事，最早記載於東漢班固的《漢書》，發生在西漢元帝竟寧元年，迄今已逾二千年，在這漫長的時間洪流裏，它不僅未被遺忘，反而透過上層文人的借喻寄托，及民間傳說的發酵蘊釀，蛻變得更加哀怨動人。自東漢至今，關於昭君故事的記述，舉凡正史、方志、小說、變文、詩歌、戲劇、俗曲等所在多有。就現存關於昭君作品的作品來看，傳沿性大於開創性，而其中又以《漢書》、《後漢書》、《琴操》、《西京雜記》、《王昭君變文》、《漢宮秋》等作最重要，對後世的影響也最深。

本文以中國古典戲劇中的體製劇種為研究對象，扣除掉一些僅餘劇名但內容亡佚之作和地方戲劇，共計得王昭君雜劇作品五部及傳奇作品二部。在這七部昭君戲劇中，可分為三類：一是《漢宮秋》，其屬落拓士人之作，特色在於內容深刻、足以反映時代思想；二是《昭君出塞》、《弔琵琶》、《昭君夢》、《琵琶語》，其屬文人劇，特色在於附庸風雅、抒發個人情感；三是《和戎記》、《青冢記》，其屬民間創作，特色在於通俗鄙俚、詼諧逗趣。

至於各劇的比較：《漢宮秋》主題思想嚴肅，曲文賓白高妙鮮活；唯對昭君的形象塑造得極為失敗，關目布置亦有未妥當處。《昭君出塞》中昭君哀怨的形象頗鮮明，曲文賓白尚稱清麗；但主題思想不夠嚴肅，僅為附庸風雅，關目布置亦太簡單，缺少變化。《弔琵琶》的關目布置和人物塑造都針對漢劇作了修正，故較為適切，其曲文賓白由於有作者才氣縱橫的經營，顯的雋雅有深度；唯主題思想一方面雖為改良漢劇，另一方面卻也侷限於表達個人的抑鬱愁牢，涵蓋面不夠寬廣。《昭君夢》主題思想僅為翻案補恨，關目布置太單純，除了漢元帝外，其他的人物塑造尚可，曲文則清綺悠揚，尚有可觀。《琵琶語》關目布置富變化，人物塑造鮮明有趣；唯主題思想仍於翻案補恨，曲文賓白亦屬普通。《和戎記》在主題思想上強調教化，千篇一律，毫無新意，在關目布置上冗長、拖沓、甚至還有顛倒誤謬處，人物塑造強調忠臣烈女、才子佳人，但對單于的性格刻畫則乏合理性，顯得盲目，曲文賓白則淺白鄙俚，帶有濃厚的民間色彩。《青冢記》的〈送昭〉、〈出塞〉中，主題思想在表達昭君的哀怨愁苦，關目布置簡單適切，人物塑造主要針對昭君，刻畫深入，曲文賓白則雅緻鄙俚均有。由此可見七劇各有優劣，就戲劇藝術而言，五部雜劇均未擅長，但其於戲劇文學上顯較突出，尤其是《漢宮秋》、《弔琵琶》兩劇，成就更在諸劇之上，屬案頭佳作。另二部傳奇在戲劇藝術及文學上仍有待改進，未為良品。



目

次

緒 論	1
第一章 王昭君故事的起源和發展	3
第一節 東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	4
第二節 唐宋時期	9
第三節 元明清時期	13
第四節 民國時期	23
第五節 小結	25
第二章 「王昭君雜劇」作者、腳色、劇情論述	27
第一節 漢宮秋	29
第二節 昭君出塞	33
第三節 弔琵琶	36
第四節 昭君夢	38
第五節 琵琶語	39
第六節 小結	42
第三章 「王昭君傳奇」腳色、劇情論述	47
第一節 和戎記	48
第二節 青冢記	54
第三節 小結	55
第四章 「王昭君雜劇、傳奇」比較	57
第一節 主題思想	57
第二節 關目布置	62
第三節 人物塑造	68
第四節 曲文賓白	75
第五節 小結	83
結 論	87
參考書目	89
參考期刊論文	92

緒 論

王昭君出塞和番的故事，據班固《漢書》記載，發生於西漢元帝竟寧元年（西元前 33 年），迄今已逾二千年，在這麼長的時間洪流裡，它不僅未被遺忘，反而透過上層文人的借喻寄託，及民間傳說的發酵蘊釀，蛻變得更加哀怨動人，因此千百年來，一直深植人心。自東漢至今，關於此故事的記述，舉凡正史、方志、小說、變文、詩歌、戲劇、俗曲等所在多有。在這些文體裡，以戲劇最爲特別，其可唱可說，是一綜合的舞台藝術，與一般單純的文字形式和俗曲不同，因此，本文欲選此爲研究對象，視其特殊的展現。關於戲劇的種類，如就唱詞而言，可分成「詞曲系」和「詩讚系」。所謂詞曲系戲劇，指的是唱詞由詞牌或曲牌的長短句構成；而詩讚系戲劇，則是由七言詩或讚（亦作攢）十字構成。若就其音樂分，則前者爲曲牌系，後者爲腔板系，腔板系的音樂只依存於聲腔和板眼上，而曲牌系則還有宮調和曲牌的另兩個基礎，因此較爲謹嚴雅致。^{〔註 1〕}在中國古典戲劇的發展中，雜劇、傳奇屬於曲牌詞曲系，至清乾隆後，腔板詩讚系的地方戲劇代之興起，故從體製劇種進入腔調劇種，本文以體製劇種爲主，扣除掉一些僅餘劇名，內容亡佚之作和地方戲劇，共計得王昭君雜劇作品五部：元代馬致遠《漢宮秋》；明代陳與郊《昭君出塞》；清代尤侗《弔琵琶》、薛旦《昭君夢》、周樂清《琵琶語》。及傳奇作品兩部：明代無名氏《和戎記》、《青冢記》。其中除了《青冢記》僅餘〈送昭〉、〈出塞〉兩齣外，剩下均是完整之作，這七部作品，就是本文的研究範圍。

對於王昭君雜劇、傳奇，一般學者僅在文學史、戲曲史或單篇論文（詳

〔註 1〕 上述詞曲系戲劇及詩讚系戲劇的介紹，參考曾師永義《詩歌與戲曲》中〈中國古典戲劇的形成〉一文。

見第一章前言部分）中簡單帶過，但一方面多只做劇情及作者介紹，未有更廣更深的敘述，另一方面，焦點則集中在《漢宮秋》，其它作品顯見忽略。民國七十七年，台大中研所學生金容雅以《昭君戲曲之研究》為題撰寫碩士論文，討論包括《青冢記》以外的六部雜劇、傳奇，但亦偏重在音律上，分析各劇的聯套、韻腳、音律協美處、誤律處、句式，又略述排場，至於其它方面則少論述，有鑑於此，本文欲另闢蹊徑，對故事的起源、發展，及各劇的作者、腳色、劇情、主題思想、關目布置、人物塑造、曲文賓白等做一較全面深入的探討比較，期能對昭君戲曲能有不同的體認和收穫。

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先以縱向的探尋，了解昭君故事歷來的起源和發展，再以橫向排比，逐一對各劇介紹，最後做綜合比較。全文共分為六部分，除了第一部分緒論，和最後一部分結論外，又別為四章：緒論首言本文的研究動機、範圍、目的、方法和內容；第一章述及昭君故事的起源和發展，範圍包括自東漢至民國中現存的文字記載；第二章介紹王昭君雜劇作品的作者、腳色、劇情；第三章則介紹傳奇，由於兩部作品的作者均不可得而知，故此章只討論其他兩項；在對各劇均有基本認識後，第四章做綜合比較，項目包括主題思想、關目布置、人物塑造和曲文賓白；最後一部分為結論，期透過上述章節的探析，得出各劇特色，因襲開創的情形及優劣。

余對於中國古典戲劇，向來一直未有接觸，就讀研究所期間，始本著一股好奇心啓蒙於葉師慶炳，沒想到就此產生極大的興趣，甚至以此為論文研究方向，民國八十二年九月，葉師慶炳不幸病逝，深令人感到難過，這一年，所幸得由曾師永義指導，並聆聽兩門相關課程，受益良多。因此，在這裡要先向兩位恩師致上最誠摯的謝意。

另外，唸研究所期間，感謝家人全力的支持，讓我能無憂無慮地安心讀書。撰寫論文的這段日子裡，首先要特別感謝摯友振興，不但時時予我關懷鼓勵，更在忙碌之餘，抽空幫我打字、改稿、排版，備極辛苦。其次舍弟建志與芳萍熱心的分擔打字，及好友阿潘、美玲的親切問候，這些都是我永銘於心，不會忘記的。

由於才疏學淺，接觸戲曲的時間又不長，僅持著一股對古典戲曲及昭君故事的熱愛，從事了這樣的研究，雖然，在研究完成後，少有新論及創見，大部分仍只作整理及補充的基本功夫，但在閱讀過程中所累積的知識和快樂，無疑是最大的收穫。

第一章 王昭君故事的起源和發展

昭君故事，起源於東漢班固的《漢書》，自此往下發展，一直到今天，仍傳沿不輟，其間歷代或增添新的情節，或藉由不同的文體呈現，使其日益豐富而多樣化。本論文既欲研究昭君戲曲，因此擬先對故事本身的源流作一番介紹，是以設立本章。民國以來，俗文學漸受重視，對此主題的探討亦不乏其人：如梁容若〈關於王昭君之歷史與文學〉、黃鴻翔〈昭君故事及關於昭君之文學〉、余我〈中國歷代文人筆下的王昭君〉、容肇祖〈唐寫本明妃傳殘卷跋〉以及〈青冢志跋〉、劉萬章〈關於王昭君傳說〉、魏應麒〈「關於王昭君傳說」的答案〉、張長弓〈王昭君〉、黃檠琇〈王昭君故事的演變〉、張壽林〈王昭君故事演變之點點滴滴〉等均是。除此之外，黃文暘撰、董康輯的《曲海總目題要》；羅錦堂《元雜劇本事考》；徐培均、范民聲主編的《中國古典名劇鑑賞辭典》，及一般的戲曲史、劇本選，在提到昭君戲曲時，多會簡述故事源流。上述資料雖豐富，但畢竟篇幅都很短，蒐集既不全面，亦少見深入探討。民國七十年，東海大學中研所學生鄔錫芬曾以《王昭君故事研究》為題撰寫碩士論文，其第四章〈與昭君故事有關的文學作品〉資料蒐集不少，但尚可補充。另外，文中對詩詞方面的討論，顯然太草率，對於《琴操》、《西京雜記》的年代亦直接沿襲前人的錯誤說法，而未予以判辨，這些，都是還要再加以修正處。本章欲就東漢至魏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民國四個時期為劃分，逐一討論此故事從開始至今的發展源流，在資料上力求完備，即使有略為提及昭君，但於故事上毫無敘述者，亦於小結處列出作者書名及內容概要以供讀者參考。詩歌由於年代橫跨西晉至清，不欲分開討論，僅將其置於元明清時期的最後綜合陳述。另外，在眾多資料中，由於傳沿性多，開

創性少，故僅對較重要或影響力較大的作品，才列出原文，其餘諸作，則直接說明來源及差異處，以下便一一論述之。

第一節 東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

此時期計有《漢書》、《琴操》、《西京雜記》、《後漢書》、《世說新語》五部作品。東漢班固的《漢書》，是昭君故事的最早記載，故本文便以此為起源論述。查《漢書》卷九，元帝紀第九中云：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摩韓邪單于來朝。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叛禮義，既伏其辜，摩韓邪單于不忘恩德，鄉慕禮義，復修朝賀之禮，願保塞傳之無窮，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為竟寧，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為閼氏。」

另外，同書卷九十四，匈奴傳第六十四下云：

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言曰：「常願謁見天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擊臣，以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王昭君號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為右日逐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呼韓邪死，雕陶莫皋立，為復株橐若鞮單于。……復株橐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為須卜居次，小女為當于居次。……漢平帝幼，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

據《漢書》元帝紀和匈奴傳所載，呼韓邪單于因郅支單于被漢朝都護甘延壽、陳湯誅斬，又喜又懼，因此上書漢帝表示臣服，竟寧元年，復入朝，自言願為漢婿，元帝便以後宮良家子王嬙賜婚單于，以示兩國友好，並保邊塞安寧，王嬙在匈奴先後嫁給呼韓邪單于和復株橐若鞮單于父子，生有一子二女，其子、婿、孫皆為匈奴的顯貴重臣，這就是王昭君故事的原始記載，文中既無描寫昭君沈魚落雁之美，亦無敘述其出塞時萬般愁苦之怨，更無言及其為全漢節而壯烈殉國之忠，相反的，對昭君和番事僅僅一筆帶過，甚為簡單，一

點也不淒美感人，事實上，昭君爲和親政策下犧牲之女子，和親政策始於漢高祖，自此以下至唐代，除東漢外，此策沿用不輟，其實行動機一方面是敷衍外國使不爲我害；一方面是羈縻外國使爲我助。而和親政策貢獻之女子，名義上雖同爲公主，然亦有等級之別，茲據《史學年報》第一卷第一期，王桐齡先生所著〈漢唐和親政策〉分其等級爲，一等：皇女、皇妹。二等：親王女。三等：宗室女。四等：宗室甥女。等外甲：功臣女。等外乙：家人子。不列等：王昭君。他接著說：

以上公主等級大概分爲七種，其以何種公主下嫁何國？須視對象物當時對中國之關係而定，無一定之標準。然對於大國有特別關係者，大都以皇女或皇妹下嫁；無特別關係者，大都以親王女或宗室女下嫁；對於小國，以宗室甥女下嫁；功臣女、家人子，皆替代皇女者，表面上應作爲皇女看待，亦下嫁大國君主；不列等之王昭君，乃下賜稱臣、納貢、入朝之呼韓邪單于者，乃完全爲贈品也。

由此可見昭君地位之低，由於呼韓邪單于是懼漢而前來朝貢的，元帝以昭君賜之，自然不必在地位上多加講究，而她和其他和親的女子相比，也顯得較不重要，史書自無必要對她大書特書，另一方面，班固生於東漢光武帝建武八年（西元 32 年），卒於和帝永元四年（西元 92 年），而昭君遠嫁匈奴是在西漢元帝竟寧元年（西元前 33 年），故班固作漢書時距離昭君史實已有一段時間，他既然對昭君的籍貫、容貌、出塞情形無詳細描寫，或許資料不足，已不可知，這不但使後代史書更難追溯歷史原貌，以作更詳盡的敘述，也給予其它文體更大的發揮空間，以充實其內容。

繼《漢書》後，《琴操》卷下的〈怨曠思惟歌〉中云：

王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昭君年十七時，顏色皎潔，聞於國中，襄見昭君端正閑麗，未嘗窺看門戶，以其有異於人，求之皆不與，獻於孝元帝，以地遠，既不幸納，叨備後宮，積五、六年，昭君心有怨曠，僞不飾其形容，元帝每歷後宮，疏略不過其處，後單于遣使者朝賀，元帝陳設倡樂，乃令後宮粧出，昭君怨恚日久，不得侍列，乃更脩飾，善粧盛服，形容光暉而出，俱列坐，元帝謂使者曰：「單于何所願樂？」對曰：「珍奇怪物，皆悉自備，惟婦人醜陋，不如中國。」帝乃問後宮，欲以一女賜單于，誰能行者起。於是昭君喟然越席而前曰：「妾幸得備在後宮，羸醜卑陋，不合陛下之心，誠願得行。時單于使者在

旁，帝大驚，悔之不得復止，良久，太習曰：「朕已誤矣！」遂以與之，昭君至匈奴，單于大悅，以為漢與我厚，縱酒作樂，遣使者報漢，送白璧一雙，駿馬十匹，胡地珠寶之類，昭君恨帝始不見遇，心思不樂，心念鄉土，乃作〈怨曠思惟歌〉曰：「秋木萋萋，其葉萎黃，有鳥爰止，集于苞桑，養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升雲，獲侍帷房，離宮絕曠，身體摧藏，志念幽沈，不得頡頏，雖得餒食，心有徊徨，我獨伊何，改往變常，翩翩之燕，遠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長，嗚呼哀哉，憂心惻傷。」昭君有子曰世達，單于死，子世達繼立，凡為胡者，父死妻母，昭君問世達曰：「汝為漢也？為胡也？」世達曰：「欲為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單于舉葬之，胡中多白草，而此冢獨青。（據平津館本）

關於《琴操》的作者，由於歷來著錄的情形不一，遂有東漢桓譚、蔡邕，東晉孔衍三種說法，針對此問題，清人馬瑞辰在平津館本《琴操》校本序中曾詳加考辯，認為該書確實為東漢蔡邕所撰，〔註1〕要注意的一點是文中所錄的〈怨曠思惟歌〉，應不是昭君自作，而可能是作者自行加入的。〔註2〕蔡邕的

〔註1〕參看容肇祖〈唐寫本明妃傳殘卷跋〉民俗週刊第二十七、二十八期合刊本，民國17年9月。張長弓〈王昭君〉，嶺南學報第二卷第二期，民國20年7月。張壽林〈王昭君故事演變之點點滴滴〉，文學年報第一期。

〔註2〕平津館本《琴操》校本序中云：

琴操之體不一，有暢、有歌詩、有操、有引、而統謂之操。暢者暢其志，桓子新論云：「達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是也。」操者顯其操，新論云：「窮則獨善其身，而不失其操是也。」引、廢同音通用，爾雅：「廢：興也。」鄭康成曰：「廢：興也，猶詩之興，是引即詩因物起興之義也。」隋經籍志載《琴操》三卷，晉廣陵相孔衍撰，崇文總目、中興書目，並以屬之孔衍，而傳注所引，及今讀畫齋叢書所傳本，皆屬蔡邕，惟初學記引笙篪引為孔衍《琴操》，其文與蔡邕《琴操》不殊，是知隋志言孔衍撰者，謂撰述蔡邕之書，非謂孔衍自著也，隋志於孔衍《琴操》外，又載《琴操》鈔二卷，《琴操》鈔一卷，不著撰人，蓋有異本，非異書也。唐志又別載桓譚《琴操》二卷，按桓譚新論有琴道篇，不聞有《琴操》，《琴操》言伏羲始作琴，與琴道言神農始作琴不合，則《琴操》決非桓譚所作，文選注引新論，雍門說孟嘗君曰：「今君下羅帳，來清風。」北堂書鈔引作《琴操》，是唐人誤以琴道篇為《琴操》之證也。蔡邕本傳言邕所著有敘樂，而無《琴操》，而今本《琴操》及傳注所引，皆屬蔡邕，疑《琴操》即在敘樂中，猶琴道為新論之一篇耳。北堂書鈔引蔡邕琴賦，言仲尼思歸，即將歸操也。梁公悲吟，即楚高梁子霹靂引也。周公越裳，即越裳操也。白鶴東翔，即別鶴操也。樊姬遺歎，即列女引也。與夫鹿鳴三章，楚曲明光，俱與《琴操》合，則《琴操》為中郎所撰，信有徵矣。

這段記載和班固的《漢書》大相逕庭，不但增加了對昭君身世、容貌、出塞原因、哀怨的描述，更違背史實地讓昭君不願再嫁單于子而吞藥自殺，如此一來，雖然與史實不符，但無疑提高了故事的戲劇性，也美化了昭君的形象，使她不僅有文才又守禮教，這對昭君故事而言，是一項重要的創作，也讓它易於被人接受而流傳下去。

接著是小說《西京雜記》，這是一本雜載人間瑣事的書，共分六卷，其卷二中云：

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人為閼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資皆巨萬，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為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為牛馬飛鳥眾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差稀。

《西京雜記》和《琴操》一樣，都有作者究竟屬誰的疑問？其作者的歸屬不外五端：一、劉歆；二、葛洪；三、吳均；四、蕭賁；五、不知姓名者。歷來說法不一，不過自從余嘉錫先生在《四庫提要辨證》中題出該書是葛洪雜鈔舊文成書而託名劉歆之作後，再經董作賓、洪業先生的補充論辯，〔註3〕現

唐志載《琴操》一卷，視隋已亡二卷，中興書目言琴調，周詩五篇，古操引，共五十篇，視崇文總目言總五十九章，又亡其四，若宋藝文志載孔衍琴操引三卷，蓋僅據隋志存其目，非真有其全書也。陳氏書錄所載周詩五篇，操引二十一篇，與今本合，是今世所傳，即直齋所見之本，惟陳氏云止一卷，今分為二卷，陳氏曰不著氏名，今題曰蔡邕撰，其分合著錄，微有不同，證之傳注，所引亦有互異，今淵如觀察，校正付梓，受而讀之，古誼所存，足以左證經傳，其言歌詩五曲，皆在大戴記投壺篇八篇可歌之中。蓋漢初樂府尚存八篇，其後《貍首》、《采芣》、《采蘋》三篇，又屢不可歌，故僅存其五，其言暴風疾雨，在周公沒後，與尚書大傳史記合，足證書金縢篇秋大熟，以下當為亳姑逸文，其言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欲諫不得，作龜山操，足證孔子為魯司寇不用之說。其言孔子聞殺趙鳴犢，作將歸操，足證孔叢子阪歌，吾將言歸為偽作。至於鄒虞白駒，不必有合於四詩之說，要不失為一家之言，是固當與月令章句獨斷諸書並傳者已，嘉慶十年長至，翰林院庶吉士，桐城馬瑞辰序。

由上述可知《琴操》一書的實際作者和歷來的著錄情形。

〔註3〕《怨曠思惟歌》非昭君自作，理由有二：

今多數學者已贊同此說，故本文亦將該書列為西晉葛洪所撰。

《西京雜記》和《琴操》有一個共通點：即都在為昭君不得見幸，以及遠嫁匈奴找一個適當的理由。《琴操》中言昭君因是邊遠的女子而不見幸，被冷落在後宮五、六年，所以當元帝問後宮，欲以一女賜單于時，昭君便在鬱積了滿腔的悲怨下請行。《西京雜記》則言元帝按圖召幸，昭君因不肯賄賂畫工而不得見御，匈奴入朝，求漢女為閼氏，元帝按圖選中了昭君，昭君只得被迫遠嫁異鄉。兩書的說法雖然都很合情理，但《西京雜記》的畫工毀圖說無疑對後世昭君故事的發展起了重大影響，因為在《琴操》的故事中，是元帝負了昭君，但在《西京雜記》中卻把整個事件的罪魁禍首全推給畫工，而讓元帝和昭君都成為無辜的受害者，這樣的安排較易引人同情，並產生共鳴，是以後世的昭君文學作品沿用不輟。另外，在故事的結局上，《琴操》言昭君自殺，《西京雜記》則未交待，自殺的情節提高了昭君的人格，加上後代逐漸講求女子的節操，因而常被襲用，《琴操》和《西京雜記》代表了早期昭君故事在民間流傳的二個不同系統，自此而下，後世文學從中取得題材，寫昭君的美、怨、節烈，寫畫工的貪財可恨，因此，這二段記載在昭君故事的演變上，擔任了創始且重要的地位，影響至深且巨。

南朝宋時，范曄著《後漢書》，其卷八十九，南匈奴列傳第七十九中云：

初，單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師以次當〔為〕左賢王。左賢王即是單于儲副。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知牙師者，王昭君之子也。昭君字嬀，南郡人也。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斐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單于死，其前閼氏子代立，

一、這首詩如果是昭君所作，《漢書》及《後漢書》不應闕而不錄。因為《漢書》西域傳錄烏孫公主歌，《後漢書》列女傳錄蔡琰的悲憤詩，不應於《漢書》匈奴傳和《後漢書》南匈奴列傳中獨闕昭君的怨詩。另外，《漢書》在蘇武傳中只錄李陵起舞之歌，而不錄世傳的蘇李贈答之什，《後漢書》在列女傳中只錄蔡琰的悲憤詩，而不錄胡笳十八拍，都足以證明二書棄取頗為嚴謹，如果此詩真是昭君所作，應不會不錄。

二、《詩鏡總論》云：「王昭君黃鳥詩，感痛未深。以絕世姿作蠻夷嬪，人苟有懷，其言當不止此，此有情而不能言情之過也。」由此亦可見此詩非昭君自作。

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勅令從胡俗，遂復爲後單于閼氏焉。

觀看《後漢書》的內容，發現其與《漢書》的昭君史實相比，實加油添醋不少：例如對昭君容貌的誇飾、對她之所以被選去和番理由的說明、對元帝見到昭君後悔恨不捨的描述、及昭君對再嫁一事的反應等等，這樣的記載，雖然使原來的事件更加清楚、合理，但我們禁不住懷疑，首次記載此事的班固，時代已有差距，既然僅如此簡單的陳述，時代相隔更遠的范曄，何以能對當時的狀況知道得更加清楚，做如此多的增添？除此之外，《漢書》中言及王牆（牆）字昭君，在匈奴嫁二夫，與呼韓邪單于生一子，並與復株鞮單于生二女；《後漢書》則言昭君字嬀，嫁二夫，與呼韓邪單于生二子。由此則前、後漢書所記，差別甚大，至於何以會如此？蓋范曄生於晉安帝隆安二年（西元398年），宋文帝元嘉元年（西元424年），因事觸怒劉義康，左遷爲宣城太守，《後漢書》就是在這個時候開始寫的，上距昭君史實已四百五十年以上，期間摻入了不少文人附會和民間傳說，范曄在作史書時，採行了這些說法，遂成此與史不符，竟帶有文學性質的記載了。至於昭君姓名、字號的問題，既然史書所載不一，自引起學者的考辯，〔註4〕本文由於著重在故事的發展，故不針對此問題詳加引述。

最後一部是南朝宋臨川王劉義慶撰的小說《世說新語》，全書共分六卷、三十六門，其卷五賢媛第十九中稱王昭君爲王明君，此乃因觸晉文帝司馬昭之諱而改，內容方面則大體本《西京雜記》而更簡略，此外，並無其它情節加入。

以上五部便是自東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有關昭君故事的記載，除了《世說新語》沿襲成分較重外，其餘均有創始功能，尤其是《琴操》的「吞藥自殺」和《西京雜記》的「畫工圖形」說，對後代的文學更有重大影響，這就是此時期的概況。

第二節 唐宋時期

此時期計有〈王昭君變文〉、〈周秦行紀〉、《歷代名畫記》、《舊唐書》、《輿地紀勝》、《野客叢書》、《樂府詩集》七部作品。

〔註4〕參見《四庫提要辨證》卷十七，余嘉錫撰，藝文印書館印行。〈西京雜記作者辨〉，董作賓撰，《閩潮》第一期。〈再說西京雜記〉，洪業撰，《中研院史語所集刊》三十四期。

首先是唐代的民間創作〈王昭君變文〉，所謂變文，是一種唐、五代時流行於寺院、民間的俗講話本，遲至十九世紀末，才在敦煌石室的藏書中被發現，民國五十年，楊家駱先生主編《敦煌變文》一書，書中將這些俗講話本予以搜集、整理、校刊，共得七十八種，並在引言中說：「變文云云，只是話本的一種名稱而已。但變文一稱，世已習用，所以本書仍稱之為變文。」由此可知將這些敦煌俗講話本通稱為變文，是犯了以偏蓋全的毛病。事實上，敦煌俗講話本可大別為講經文、變文、押座文三種，其差異在結構方面。其中的變文，依內容分類，有演釋佛經、敷衍歷史傳說、歌詠時事、敘懷或遊戲四種，份量以演釋佛經的最多。若依韻散組合的形式來看，主要有韻散重疊、韻散相成、韻散相生三種，但像劉家太子變、祇園因由記全是散文；舜子變除了最後以二絕句作結外，亦俱為散文，這是較特別的。（註5）

在《敦煌變文》一書中，有一篇內容敘及昭君故事者，但卻沒有標題，編者將之題為〈王昭君變文〉，就其形式、結構而言，是十分吻合的，這篇〈王昭君變文〉在內容上屬於敷衍歷史傳說，在體製上則為韻散相成的形式，至於寫作年代，約在唐穆宗長慶至唐僖宗中和年間（西元 821～884 年）。全文分成上下兩卷，上卷前有缺損，而下卷完好，上卷從昭君到匈奴後開始說起，由於起首缺去的行數甚多，故不能得知她何以遠嫁，但下卷有言：

昭軍一度登千山，千迴下淚，慈母只今何在？君王不見追來。當嫁單于，誰望喜樂。良由畫匠，捉妾陵持，遂使望斷黃沙，悲連紫塞，長辭赤縣，永別神州。

由此可知，這是從畫工毀畫的說法，當和《西京雜記》出於同一系統，在上卷缺去的行數中，或許有言及畫工的。在這篇變文中，作者全力描寫昭君入胡，觸目皆非，鬱鬱寡歡的怨恨惆悵，單于見她因悶悶不樂終致得病，於是千方百計地想要討她歡心，並醫治她的病，只可惜天不從人願，昭君由於憂愁太深，不久便死去了，單于悲慟不已，予以隆重厚葬，墳高數尺，號稱青冢。後來漢哀帝發使和番，遂差漢使楊少徵前來弔祭，全文便結束在祭詞中，鄭振鐸在《中國俗文學史》上冊中說：「以這樣的祭詞作結束，在『變文』裡

〔註5〕王師夢鷗在《唐人小說校釋》的〈周秦行紀〉、〈周秦行紀敘錄〉、〈牛羊日曆〉、〈周秦行紀論〉、及附錄〈牛羊日曆及其相關的作品與作家辨〉等篇中對此問題論辯甚詳，另外，劉開榮在《唐代小說研究》、汪辟疆在《唐人小說》書中皆有相關的論述，此處乃綜合王師夢鷗的結論而成。

是僅見。」可見其結構的特別。

觀察〈王昭君變文〉和前一時期諸作的最大不同處有二：一是著重對單于的描述。在前此的作品中，對單于都只是輕描淡寫，頂多說他得到昭君後大為歡喜而已，但在變文中，單于對昭君的珍愛疼惜，深情無限，卻躍然紙上，深深令人感動，反觀對漢元帝的一無所述，則單于雖是自請和親，造成昭君一生悲劇的始作俑者，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卻也變成有情有義，通達事理的君王，令人不忍責怪了。變文和前此昭君故事的第二個不同點，在於對結局的安排。史書說昭君到匈奴後，再嫁生子，《琴操》中說單于死後，子世違繼立，欲從胡俗復妻昭君，昭君因此而吞藥自殺，無論是那種結局，昭君都已嫁給呼韓邪單于，並在匈奴生活一段時間，但到了變文中，昭君和番後，因思鄉情切，難以排遣，沒多久就病死了。元代馬致遠的雜劇《漢宮秋》，進一步說昭君和番後，不願入胡，因此行至番漢交界的黑龍江，便投河死了。昭君由在匈奴老死、生活一段時間、入胡沒多久而病沒、至未入胡而亡，這一步步的演進，使昭君愈來愈節烈，人格也相對的提高，增加人們對她的尊敬。綜上所述，後世雜劇的作者，每每把單于塑造成「只愛美人不愛江山」的痴情種，不但為昭君而大舉興兵，甚至願為她答應任何要求。另外，在昭君的結局安排上，多讓她壯烈殉國，這其中很有可能就是受到唐代變文的影響。

在這篇變文中，有的詞語不甚可解，甚至還有些訛字，此乃因它是民間文學之故，所以只求音相同，於字則不甚推敲，但就文學技巧而言，此篇想像豐富、結構嚴謹、描寫細膩，不可不說是一篇佳作，且於昭君故事的演變上，也負起了漢魏六朝至元雜劇間的重要銜接。

其次是唐人小說〈周秦行紀〉，該篇取自《太平廣記》卷四八九的雜傳記類，篇末不注出處，僅於題下附注「牛僧孺撰」四字，歷來文人或以此為牛氏所作而大加批評，但到了南宋初年，已引起書志家的懷疑，據今人詳加考證，此篇系李德裕門人韋瓘有心構陷牛氏之偽作，年代在唐文宗太和末至開成中，目的止於罷免那無禮於君，且不忠不孝的牛僧孺。〔註6〕〈周秦行紀〉中對昭君的描寫，有符合史實言其嫁給單于父子者，但對此事頗表鄙薄；亦有沿襲《西京雜記》中畫工構陷之說者，但卻明言此畫工即是毛延壽。由此可概略勾勒出韋瓘對昭君故事的描述是：昭君美豔動人，卻為畫工所誤，而

〔註6〕上述據曾師永義〈關於變文的題名、結構和淵源〉整理而來，收錄於《說俗文學》一書，聯經出版社。